

# 蒋介石的对苏纠结 与抗日决断(1936—1937)\*

鹿锡俊

**内容提要** 对1936—1937年间的蒋介石而言,如何综合处理对日对苏关系及其中“抗日”与“防共”这一组复合性的课题,是一个两难抉择。基于“倭患急,俄患缓;俄患大,倭患小”的根本认识,他在这一阶段总体上仍以促使日苏两大强邻相互牵制为目标,故一边为合作抗日而推进与苏联、中共的谈判,一边则在对外外交上以日方最重视的防共问题为筹码,谋求缓和中日关系。西安事变后,蒋虽在抵抗日本侵略方面日趋坚定,但在联苏问题上依然处在纠结之中。最后,在日苏两国对华姿态日趋相反的客观形势下,蒋才为以缓制急而被迫发动对日抗战。在研究蒋介石的这一心路历程时,必须重视其中的多元性、变动性与反复性。

**关键词** 蒋介石 抗日 防共 联苏 中日苏关系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来自日本的侵略威胁和源自苏联的“赤化”危机,如何综合处理“抗日”和“防共”这一复合性的课题,对国民政府而言,是一个利害交叉的两难抉择。笔者迄今已通过数篇论文,追踪了1931年至1935年间蒋介石处置这一课题的心路历程。<sup>①</sup> 本文作为后续研究,旨在依据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保管的《蒋介石日记》手稿与“国史馆”、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等机构收藏的相关档案,以及日本外交文书等中外原始资料,解析华北事变以后即1936年至1937年间蒋介石的对苏考量,并以此为理解蒋介石处理中日苏关系时的纠结及最终走向联苏抗日的深层背景,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

\* 本文系日本学术振兴会科研基金项目「日中戦争の虚像と実像:蒋介石ら要人達の日記の多角的且つ通時的相互検証による新探索」(基盤研究C:15K03290)的阶段性成果之一。本文曾以《蒋介石的对苏考量与中国对日抗战的发动》为题,在2015年7月台北“国史馆”主办的“战争的历史与记忆:抗战胜利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

① 参见鹿锡俊《1932年中国对苏复交的决策过程》,《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蒋介石的中日苏关系观与“制俄攘日”构想——兼论蒋汪分歧的一个重要侧面》,《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蒋介石与1935年中日苏关系的转折》,《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

## 一、从“联苏抗日”到“借日制苏”的摇摆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在考虑对日对苏政策时,除了受到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外,主要是以日本和苏联对中国主权和国民党政权的态度为基准。在1935年6月日本发动华北事变以前,在主权问题上,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的大片领土,并建立伪满洲国;苏联则在国民政府诞生以前,就和中国在外蒙问题及中东路问题上存在冲突,1933年后,中苏双方还因苏联利用盛世才染指新疆而产生了新的矛盾。另外,在对待国民党政权的态度问题上,1935年华北事变前,日本并不以打倒蒋介石及其主导下的国民政府为旗帜;苏联则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登场后,即以支持中国共产党和打倒蒋介石、推翻国民党政权为方针。因此,在华北事变以前,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不仅把日本与苏联都看作外患,而且在整体上还把苏联视作比日本更危险的心腹之患。这是蒋介石长期否定联苏抗日构想,并力求以中立态度促成日苏相互牵制,达到“制俄而攘倭,制倭而攘俄”双重目标的根本原因。<sup>①</sup>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在对待中国的主权问题上,继侵占东北后,进而分离华北,逼迫中国接受“广田三原则”。蒋介石视之为将整个中国“满洲国”化的重大危机。不仅如此,在对待中国的政权问题上,日本还由军部出面,力图打倒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与此相反,以1935年7月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为契机,苏联为避免遭受来自德国与日本的两面夹击,致力于推动中国对日抗战,以使日本陷入中日战争而无法北进。为此,苏联开始改变过去打倒蒋介石、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政策,转向承认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地位。对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来说,日苏两国在对待中国政权态度上的这一根本性的逆转,既是决定中国生死存亡的关键点,又是当政者思考今后大计的新的出发点。

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蒋介石重新调整中国的对日、对苏政策。1935年7月,他密令驻苏武官邓文仪亲赴新疆,调查已成为中苏之间重大障碍的新疆问题的真相,以为重构中苏关系作准备。<sup>②</sup>9月24日,刚刚上任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发表谈话称:“为把企图阻止华北局势明朗化的国民党党部和蒋介石政权从华北驱逐出去,即使动用武力也是无可奈何之事。”<sup>③</sup>翌日,中国驻屯军散发题为《日本对华之基础观念》的小册子,强调:比起转向亲日来,国民党转向亲苏的可能性更大,最近已有很多消息证明“蒋介石有与苏俄结合受其援助,企图妨害帝国政策之证迹”,所以日本和蒋介石不共戴天;再者,中国共产党问题根源于国民党的恶政,故欲实现防共须先摧毁国民党。<sup>④</sup>面对这些威胁,蒋介石于10月2日的日记中断定:“倭寇仍主张逼我屈服,其所最畏者:甲、我抵抗,乙、联俄。”翌日,他强调:日本除了想逼中国承认伪满和割据华北、控制中国经济与军队外,还企图以强迫中国共同排俄而使中国守战皆非,进退维谷。<sup>⑤</sup>这些都说明:蒋介石深知,日本自发动华北

① 参见鹿锡俊《蒋介石的中日苏关系观与“制俄攘日”构想——兼论蒋汪分歧的一个重要侧面》,《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

② 邓文仪:《冒死犯难记》下册,台北,学生书局1973年版,第24、33—49页。

③ 「『北支自治体の結成 指導の必要あり』多田軍司令官声明」,『東京朝日新聞』(朝刊),1935年9月25日、第2版。

④ 中译文详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外交”(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30—243页。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5年10月2日、10月3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下同。笔者注:(1)在某些人名、地名的标记上,蒋介石日记与我们现在约定俗成的用法有所不同,为保留日记的原貌,本文在引用原文时一概不加变更。电报等其他史料亦如此处理。(2)胡佛研究院所藏蒋介石日记因为是手稿,个别文字上难免有不通顺甚至错、漏之处,只要不影响读者的理解,本文均保留原文。但对易造成误解的地方则略作修正,并以〔〕标明。(3)这一时期的蒋介石日记系写在预先印好年月日的本子上,因此,一些内容因篇幅不够而移写在其他页面。为方便读者查找,笔者对此在( )中加以注明。

事变后特别坚持要求中国接受的“共同防共”，实质是逼迫中国与之建立反苏同盟，中国如果接受，就将因拱手交出对日因应上的最后依托而自陷绝境。正是在这样的认识下，在日本于10月7日提出包括“共同防共”在内的“广田三原则”后，蒋介石和孔祥熙于同月18日晚共同会见了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会谈中，蒋以中国军队总司令的身份，希望苏联同中国签订一个“有实质性的真正促进中苏亲密关系并能保障远东和平的协定”。<sup>①</sup>同月26日，蒋介石再次确认，就内政来说，解决中共问题的“中心在俄”，如为釜底抽薪计，应围绕此中心与背景下手；就国际来看，“倭之所惧者为俄”，所以，“此时外交应于俄特加注意”。<sup>②</sup>很明显，在日本军政双方的步步进逼下，蒋介石已决心反其道而行之，从日本最畏惧之“联俄”着手打开局面。

另一方面，苏联也正在高度警戒日本的华北分离工作及“广田三原则”。因为他们认定：“广田三原则”包含反苏内容，日本正为准备反苏战争而强行制造所谓华北自治，而一旦这个计划得以成功，日本就能实现其对苏图谋。<sup>③</sup>因此，12月14日莫斯科训令鲍格莫洛夫转告蒋介石：苏联愿意就蒋10月18日的建议与中方进行具体讨论。<sup>④</sup>12月19日，鲍格莫洛夫遵令向蒋介石传达了苏方的上述意见。蒋介石在表示感谢的同时，就如何消除往昔妨碍中苏关系的障碍，提示了中方的基本考虑，即：1. 中苏关系应以1923年的孙文越飞宣言为基础；2. 只要中共改变颠覆中央政府的方针，国民政府即可承认中共的存在。<sup>⑤</sup>

就这样，在日本制造的华北危机中，蒋介石为抗日而不惜联苏，又为联苏而不惜重新考虑对中共的政策。作为其中的重要步骤，同年圣诞节前夕，蒋派遣陈立夫化名李融清赴苏同苏方及中共就建立抗日合作关系进行秘密交涉。<sup>⑥</sup>在此前后，曾养甫、邓文仪等人也衔蒋介石密令，为实现共同抗日而加紧展开多方面的对苏、对中共工作。<sup>⑦</sup>

与之相应，在对日方面，随着11月1日汪精卫被刺，国民政府内部亲日派的势力加速走向衰落。11月上旬，国民政府不顾日本反对，开始实行币制改革。同月中旬，国民党召开五大，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以此为契机，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转向“不惧应战”。<sup>⑧</sup>11月25日，日本唆使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国民政府立即将殷定为汉奸而公开通缉。

但是，尽管蒋介石在对日对苏政策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进入1936年后，中苏关系的发展却并不顺利。其原因是中苏之间的分歧、国共之间的矛盾、日本的政变及伴之而来的蒋介石的摇摆。

先看中苏之间的分歧。它首先表现为双方在目标上的对立。蒋介石对今后的中苏关系的目标，是缔结针对日本的带军事性质的互助条约。在1936年1月22日和鲍格莫洛夫长达两小时的会谈中，蒋介石表明，中国要求苏联承担的大致义务是一旦日本侵占蒙古、绥远或山西，中苏将互相援助。但苏方为避免卷入中日战争，早在1935年12月末的内部指示中就已决定拒绝缔结有约束

① 《鲍格莫洛夫致外交人民委员部电》(1935年10月19日)，李玉贞译：《〈中苏外交文件〉选译(上)》，《近代史资料》总79号，1991年7月，第219—221页。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5年10月26日。

③ 《鲍格莫洛夫致外交人民委员部电》(1935年12月9日)，李玉贞译：《〈中苏外交文件〉选译(上)》，《近代史资料》总79号，1991年7月，第223页。

④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致鲍格莫洛夫电》(1935年12月14日)，李玉贞译：《〈中苏外交文件〉选译(上)》，《近代史资料》总79号，1991年7月，第224页。

⑤ 《鲍格莫洛夫致外交人民委员部电》(1935年12月19日)，李玉贞译：《〈中苏外交文件〉选译(上)》，《近代史资料》总79号，1991年7月，第224—225页。

⑥ 参见陈立夫《成败之鉴》，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版。

⑦ 参见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⑧ 参见鹿锡俊《蒋介石与1935年中日苏关系的转折》，《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

力的中苏互助条约<sup>①</sup>,故鲍格莫洛夫对蒋的提案仅答以“向莫斯科报告”。<sup>②</sup>但其后苏方一面继续在私人性质的谈话中竭力鼓励中国抗日,一面却只主张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对中方关于互助条约的建议则避免做出负责任的答案。<sup>③</sup>

与此相关,中苏之间的第二个分歧表现为对中共方针的龃龉。在1月22日的会谈中,双方在中共问题上花费了80分钟。蒋强调:如何处理中共军队是最重要的问题,只要在这一点上达成协议,其他问题都可迎刃而解。为此,蒋希望苏联能通过施加压力,促使中共同意: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和总指挥的权威,同时保留其现有人员参加抗日。但鲍格莫洛夫却以“内政”为由予以拒绝,称苏联决不能扮演“任何居中调解人的角色”。<sup>④</sup>另外,苏方还反对蒋介石以孙文越飞宣言为中苏关系基础的要求。因为他们确信,如果将这一承认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宣言作为基础,等于“在背后捅中共一刀”。<sup>⑤</sup>

当中苏关系因上述分歧而陷于僵局之际,在由蒋介石派往苏联和国内中共控制区的使者和中共之间的谈判中,中共方面的反应也出乎蒋介石的意外。据邓文仪在莫斯科和中共代表潘汉年的谈话,蒋介石解决中共问题的基本方针包括四点:1. 取消苏维埃政府,归顺南京;2. 取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3. 共产党可以存在,或共产党全部加入国民党;4. 改编后的红军全部开赴内蒙前线地区驻防抗日。<sup>⑥</sup>但中共拒绝了这些条件。2月下旬,陕北的中共红军还发动了东征山西的战役,使蒋介石大感震惊。

正在此时,2月26日,日本皇道派军人发动政变,杀害军政要人,占领首相官邸。虽然事态于2月29日就被平息,但蒋介石误判,日本的这次政变将使其关东军不待中国问题解决即向俄挑战,故“不出三个月必引起倭俄之战”。<sup>⑦</sup>这种日苏先战的前景,与前述中苏分歧及国共对立互为作用,使本来就日苏先战为中国解决对日对苏问题最佳机会的蒋介石再次调整外交战略。其中,在对日方面,蒋介石于3月3日考虑,中国应“在中立原则而不妨碍倭之抗俄程度以内与之谈判”。<sup>⑧</sup>在对苏方面,蒋介石的评价则重返负面。3月8日,他决定在对苏对共问题上,应持“‘晋匪’未受打击以前不与之商讨一切”的态度。<sup>⑨</sup>3月17日,他强调,在研究对苏利害问题时,应重视以下问题:“甲、‘共匪’消长;乙、倭寇态度;丙、内忧大小;丁、民心向背;戊、国际利害;己、主义异同;庚、最后祸福。”<sup>⑩</sup>3月18日,他研究“倭俄利害”时,特别注意“新疆、外蒙与东北之关系”,并担心“如俄不守信义则如何?”他写道,“倭以对俄为主题,应知‘先其所爱微与之期’,而要在‘践墨随敌以决战事’

① 《斯托莫尼亚科夫致鲍格莫洛夫信》(1935年12月28日),李玉贞译:《〈中苏外交文件〉选译(上)》,《近代史资料》总79号,1991年7月,第225—226页。

② 《鲍格莫洛夫致斯托莫尼亚科夫电》(1936年1月22日),李玉贞译:《〈中苏外交文件〉选译(上)》,《近代史资料》总79号,1991年7月,第227—229页。

③ 蒋廷黻任驻苏大使后也对此深有感受。参见《蒋廷黻致外交部报告》(1937年4月),《民国档案》1989年第1期,第25—31页。

④ 《鲍格莫洛夫致斯托莫尼亚科夫电》(1936年1月22日),李玉贞译:《〈中苏外交文件〉选译(上)》,《近代史资料》总79号,1991年7月,第227—229页。

⑤ 《斯托莫尼亚科夫致鲍格莫洛夫的信》(1936年5月19日),李玉贞译:《〈中苏外交文件〉选译(上)》,《近代史资料》总79号,1991年7月,第231—233页。

⑥ 《潘汉年与邓文仪1936年1月13日谈判情况纪要》,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314页。

⑦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6年2月29日,“本月反省录”。

⑧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6年3月3日。

⑨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6年3月8日。

⑩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6年3月17日。

也”。<sup>①</sup> 3月21日,蒋介石和孔祥熙一起会见鲍格莫洛夫。在蒋表明“中国政府不会同意‘广田三原则’”后,孔祥熙对苏联政府迟迟不答复中方关于缔结中苏反日互助条约的建议表示了失望。但鲍格莫洛夫反而说“中国作为提议者应该首先说明自身对条约的具体想法”。<sup>②</sup> 苏方的态度使蒋介石更感不满。在该日的日记中蒋写道,“对俄外交希望绝少,而其狡猾险狠则过于倭寇”。因此,他还痛感“一般书生文人以为非联俄则不能生存,青年无智者多从而附和之,非痛加惩戒无使之觉悟也”。同时,蒋对政变后的日本认为“倭态以内部纷乱,对我不得不渐取缓和之势”。<sup>③</sup> 因此,24日蒋决定“对民众与‘赤匪’宣言:甲、抗日决不为第三国际作牺牲品与傀儡;乙、爱国者不祸国亦不屠民。丙、出卖民族,使民族永为第三国际之奴隶,其贻祸之烈甚于汉奸之被逼也”。<sup>④</sup> 同日,他还电令张群:对矶谷廉介(日本驻华武官,其时刚升任陆军省军务局局长)“应坦白表示如其能尊重我冀察主权改善国民感情则诸事非无妥商余地,而且我等正努力于此,勿以寻常之应酬语视之。如东北问题能同时解决,一扫两国之障碍,更为切盼也”。<sup>⑤</sup> 翌日,蒋还提出以对苏为交换筹码的对日方案,谓“如倭能还我满洲主权,则先与商议对俄协定,此为最大之希望。其次,取消塘沽协定与冀东察北战区,则允其资源之接济,不然则作为悬案”。<sup>⑥</sup>

上述事实说明,在对苏与对中共关系事与愿违,而对日关系却似有转机的背景下<sup>⑦</sup>,蒋介石降低了对联苏制日和国共合作抗日的热情,在对苏对日政策上重新回到了“以中立谋日苏相互牵制”的老路,以等待日苏先战而乘之。

恰在这个关头,3月底,苏联和外蒙于3月12日签订互助协定的消息曝光。当蒋介石就这一突发事件对苏表示愤慨时,鲍格莫洛夫竟声称其在3月21日的会谈中已向蒋通报过此事,并“以发表私言相恫吓”。<sup>⑧</sup> 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常以苏联和外蒙的关系为自己的侵华辩护。就在1935年9月7日广田弘毅外相与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的会谈中,广田也曾抱怨:“中国对苏联在外蒙古的所作所为不闻不问,却总对‘满洲国’问题喋喋不休。”<sup>⑨</sup> 因此,此次苏联视外蒙为主权国家而与之签订互助协定的事,使蒋备感尴尬和耻辱。其后,蒋介石的对苏感情更趋恶化,而进一步致力于其日苏相互牵制战略中“借日制苏”的一面。下面试举几例。

4月2日,针对苏蒙订约后的新形势,蒋介石确认,“俄态日露,已逼我无依违两可之余地,更不可有乘机取巧之观念,唯有以事实与我革命主义为重,似无所用其徘徊也”。基此判断,蒋确定两点,即:“外蒙领土与主权非使俄承认不可”;“中共非解决不可”。<sup>⑩</sup> 翌日,蒋谴责苏联“国无信义,人尚欺诈”,“外交之卑劣毒辣,一如乡间之土霸无赖,可恶已极”。<sup>⑪</sup>

4月7日,蒋介石令国民政府外交部就苏蒙互助协定向苏方提出抗议。同日,他还考虑“委宋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6年3月18日。

② ボリス・スラヴィンスキー著、加藤幸広訳『日ソ戦争への道』、共同通信社、1997年、57—58頁。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6年3月21日。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6年3月24日。

⑤ 《蒋介石致张群电》(1936年3月24日),周珣环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36),台北,“国史馆”2008年版,第181—182页。

⑥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6年3月25日(写在3月份的“本月反省录”栏目中)。

⑦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6年3月26日、29日。

⑧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6年4月3日、5日。

⑨ 『広田大臣蒋大使会談録』(第2回)(1935年9月7日)、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帝国ノ对支外交政策關係一件』、A. 1. 1. 0. 10。

⑩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6年4月2日。

⑪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6年4月3日。

以冀察交涉之权,使倭寇安心,得以专意对俄”。<sup>①</sup> 而外交部部长张群也于此日与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会谈。据须磨的记录,当须磨提及中国对苏抗议问题时,张群表示,中国因无力独自抵抗苏联,愿同日本缔结军事同盟。<sup>②</sup>

4月8日,蒋介石致电正在欧洲伺机和中共谈判的陈立夫“即速回国”。<sup>③</sup> 同日,蒋还召戴季陶谈话,商决对苏方针。在该日的日记中,蒋谓“倭寇狭小,俄仇疑忌,两种侵略主义之横暴仇恨诚无独有偶。倭伪协定之启其端,俄蒙协定之结其果,倭俄战争以理测之,当迫在眉睫”。<sup>④</sup>

4月9日,张群报告蒋介石,苏联认为中国的对苏抗议是迫于日本军人的压力。蒋当即指示张“应备文据理驳复”。<sup>⑤</sup>

4月10日,蒋介石决定“对外侧重倭寇之运用;对匪注重晋陕之肃清”。<sup>⑥</sup> 作为对日“运用”的一环,据4月13日须磨给东京的报告,吴震修将受蒋介石之托前往东京密商缔结模仿日满军事协定的、以河北、察哈尔、绥远为范围的中日防共军事协定,以借此维持中国对外蒙的地位。<sup>⑦</sup> 在此前后,时任铁道部部长的张嘉璈也派其秘书张水淇于4月8日至18日间五次访问须磨,与之面商缔结中日防共军事协定之事。<sup>⑧</sup>

## 二、中日苏关系的互动:日本的观察与苏联的反观察

但是,尽管蒋介石在动摇中从“联苏抗日”转至“借日制苏”,日本对蒋介石“二重外交”的不信任感却一如既往。这是因为,自邓文仪受蒋之命赴新疆调查后,关于邓文仪使命与中苏关系变化的情报就陆续汇集到了东京。其中,1935年10月17日,关东军参谋部提出了一份题为《关于苏联赤化新疆的情况》的调查报告,在详细论述了新疆事实上已成为苏联势力范围以后指出:第三国际在最近的第七次大会上,决议推动各种反帝团体的合作与团结,并把“赤化”重点指向中国。尽管如此,蒋介石因为剿共的困难和日本华北工作的威胁,不仅不对第三国际提出抗议,反而再次转向亲苏容共政策,以图一面牵制日本及列强,一面政治解决红军问题。此外,在关于“新疆独立”及苏维埃化的消息到处盛传的今日,中国驻苏大使馆武官的新疆之旅,证明了中苏在新疆的接近,对此必须注意。<sup>⑨</sup>

在邓文仪结束对新疆的考察经莫斯科回国报告后,日方对他在南京的活动自然也严密注意。11月16日,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致电广田外相,报告了由内线直接从邓文仪处探听到的消息:南京抗日空气之所以高涨,主要有两大原因:其一,邓在苏时,苏方屡次劝告:“中国应该改变对日政策,不要对日本的要求唯唯诺诺。果能如此,苏联愿提供比意大利更便宜的飞机”;其二,红军现在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6年4月7日。

② 须磨弥吉郎「支那最近ノ决意振リ卜露支関係ノ再吟味」(1936年4月27日)、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帝国ノ对支外交政策関係一件」、A.1.1.0.10。

③ 《蒋介石致程天放转李融清》(1936年4月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20200-00032-058。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6年4月8日。

⑤ 《蒋介石对张群来电之批示》(1936年4月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200-00265-021。

⑥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6年4月10日。

⑦ 「在南京须磨总领事ヨリ有田外務大臣宛第315號電」(1936年4月13日發)、日本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II第1部第5卷上、日本外務省,2008年,55頁。

⑧ 须磨弥吉郎「支那最近ノ决意振リ卜露支关系ノ再吟味」(1936年4月27日)、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帝国ノ对支外交政策関係一件」、A.1.1.0.10。

⑨ 關東軍參謀部「ソ連邦ニヨル新疆ノ赤化狀況」(1935年10月17日)、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支那ソ連邦外交關係雜纂」、A.2.2.0.C/R1-3。

已不是对华中地区的直接威胁,而彻底剿灭亦费时间,故蒋介石要以新的旗帜来促进统一和消除反蒋空气。<sup>①</sup>

到1935年末,日方通过中国驻苏使领馆中的内线,已弄清了邓文仪新疆之行的基本情况。在一份题为《新疆省实况与中苏关系》的报告中,作者指出:南京政府依然在搞“二重政策”,一边表明为防止“赤化”和经济提携而谋中日协作,一边联合莫斯科而图阻止日本。<sup>②</sup>

因此,在蒋介石于同年底亲任行政院长并任命具有留日经历的张群等人出任政府要职之时,须磨仍认定蒋介石不可能真心推行亲日政策,称“中国今后极可能对日恢复革命外交”。<sup>③</sup> 1936年1月22日,中方公开否认蒋同意接受“广田三原则”后,日本的反蒋情绪更加强烈。2月起,其卵翼下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实行特别关税,日本势力在华猖狂走私。另外,日本的解密资料显示,3月中旬,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要职的何键,向日本密报了“陈果夫在绝密状态下抵达莫斯科,现正暗中策划中苏合作”的重大机密。<sup>④</sup> 由于何键的告密在两个关键问题上存在错误(其一,把陈立夫说成了陈果夫;其二,把陈立夫尚在苏联境外待命,说成是已抵达莫斯科),结果,日本在探明陈果夫尚在国内后,对何键之说未能确证。<sup>⑤</sup> 但是,从总体上看,他们对蒋介石的排斥心更趋强烈。<sup>⑥</sup> 3月下旬,日本关东军宣称,南京政府在思想上以排日为生命,在财政上以欧美为后盾,所以本质上不可能对日亲善。它并据此提出,对付中国的唯一办法是“按照人文与地理条件使中国大陆各自分立,各分立地区与日本直接结合”。<sup>⑦</sup> 在蒋介石于4月通过吴震修等人对日提议共同防共后,作为交涉窗口的须磨立即告诫东京:蒋介石的真实企图只是对日试探,故日方不应和蒋的代表讨论军事协定的具体方案,而应要求中方同意解决整个华北的问题,“只要华北问题得到解决,军事协定也就水到渠成了”。<sup>⑧</sup> 4月下旬,须磨还强调,蒋介石对日持机会主义态度,其所谓剿共具有掩护抗日的一面,目前中国内部联苏论十分强大。<sup>⑨</sup> 结果,日本不仅无视蒋介石的提议,且从5月15日起以“应对赤祸”为名,强行将其在华北的中国驻屯军从1771名增至5774名。至于日本在华北的走私,据孔祥熙5月20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报告,“情形至为严重”,“不惟影响国库收入,且关系国民生计”,“现走私范围已由华北而渐及长江一带,如不紧急严处,日甚一日,国内工商业有总崩溃之虞”。<sup>⑩</sup>

① 「有吉大使より廣田外務大臣宛電報」第958號(1935年11月16日)、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支那ソ連邦外交關係雜纂」、A.2.2.0.C/R1。

② 详见小柳領事「新疆省事情並ソ支關係」(1936年1月)、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支那ソ連邦外交關係雜纂」、A.2.2.0.C/R1-3。

③ 須磨弥吉郎「蒋介石新政府卜之二對スル帝國ノ政策考察要綱」(1935年12月)、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帝國ノ對支外交政策關係一件」、A.1.1.0.10。

④ 「三浦總領事ヨリ廣田外務大臣宛」第59號の1、2(1936年3月18日)、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支那ソ連邦外交關係雜纂」、A.2.2.0.C/R1-3。

⑤ 参见鹿锡俊《日本对中国的观察与陈立夫访苏计划的泄密》,《党的文献》总第79期,2001年1月。

⑥ 1936年6月13日,蒋介石在给杨杰的电报中说:“去年余到北平邀梅津今春在沪邀铃木皆被拒绝。即如上次土肥原来华,余本令萧叔宣特由牯岭赴京招待,且嘱其如土欲见余尽可令萧陪来,而乃土对萧并无一言提及余余之语”。详见《蒋介石致杨杰电》(1936年6月1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200-00266-067。

⑦ 「關東軍ノ任務ニ基ク對外諸問題ニ関スル軍ノ意見」(1936年3月28日)、日本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卷、原書房、1988年、330—334頁。

⑧ 「在南京須磨總領事ヨリ有田外務大臣宛第315號電」(1936年4月13日發)、日本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II第1部第5卷(上)、日本外務省、2008年、55頁。

⑨ 須磨弥吉郎「支那最近ノ決意振リ卜露支關係ノ再吟味」(1936年4月27日)、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帝國ノ對支外交政策關係一件」、A.1.1.0.10。

⑩ 《中政会第14次会议速记录》(1936年5月20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中央政治会议速记录,类00.1号236。

这样,同过去的多次尝试一样,进入1936年后,蒋介石以协商共同防共而争取日本改善对华政策的努力再次遭到日本的拒绝,而蒋盼望的日苏开战当然也未发生。5月中旬,在“倭在华北增兵已取包围北平之势”<sup>①</sup>的严峻形势下,为了应对危机,蒋介石只得重敲苏联之门,要求恢复中苏交涉。<sup>②</sup>

对于蒋介石的变化及其原因,苏联当局看得非常清楚。5月19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在致鲍格莫洛夫的信函中指出:尽管东京发生了2月兵变,近三个月来日本军国主义者对政府的影响日渐增强。这种倾向使日本军阀一向主张的肢解中国的方针占了上风,日本军阀已在准备并部分占领了华北。信函具体分析说:“在日本武装力量保护下的大规模走私活动,对于推行蚕食中国的政策具有重大作用。日本军阀利用这种走私活动收到了‘一箭几雕’的效益:(1)把抗日斗争中作为中国统一和巩固因素的财政改革化为乌有。因为海关收入是南京政府预算的根基,这种无与伦比的大规模的走私活动正在破坏中国中央政府的国力根基和生存基础;(2)破坏中国工业;(3)改变着日本、英国和其他国家间出口的比例,使之有利于日本,并从而把越来越广泛的日本各界吸引到他们在中国进行的冒险政策中来。”信函接着说:日本的破坏行为“客观上迫使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走上抗日之路。因此可以预料,不仅在中国舆论界,而且在中国当政者中间,对苏联的向往会进一步加强。近据各种线索获得几件情报,确证蒋介石甚至准备武装抗日”。最后,信函在指出“蒋介石的主要方针仍然是争取时间,利用未来的日苏战争仍然是蒋介石的最大希望”后,下结论说:“目前可以认为,因苏蒙条约的签订而出现的我们同中国的冲突已经不复存在”。<sup>③</sup>

苏联的观察可谓一针见血。5月27日,孔祥熙再次访问鲍格莫洛夫,要求缔结中苏互助条约,并强调“该条约可阻止日本侵略,因为日本没有能力同时对中苏两国开仗”。<sup>④</sup>5月30日,蒋介石本人在和英国政府财政顾问李滋罗斯(Frederick W. Leith-Ross)谈及日本在华北的走私时宣布:武装抵抗的时刻正在到来。长城以内各省份和东北地区不同,对它们的占领等于宣战。我的政策曾是忍耐和抑制全国的抗日情绪,但目前已确认达到了极限。华北的海关是关键问题,对海关的任何侵害都将被认为是宣战。华北不是地方问题而是一个国家问题。如宣战,那就是一场民族间的战争,全国的资源都将被动员起来。蒋最后还特地要求李滋罗斯把中国的宣战决心转告日本政府。<sup>⑤</sup>6月19日,蒋介石还更加明确地对李滋罗斯表明,在解决中共问题后,中苏即使结盟也不足为奇,如果日本不改变政策,中日冲突就无法避免。<sup>⑥</sup>

### 三、在“共同防共”问题上的灵活因应

在中苏分歧及苏蒙互助协定所引起的蒋介石的对日接近因日本的排斥性反应而遭到挫折后,日本与苏联在对华政策上的相反姿态日趋显著。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6年5月22日。

②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致鲍格莫洛夫电》(1936年5月22日),李玉贞译:《〈中苏外交文件〉选译(上)》,《近代史资料》总79号,1991年7月,第229—230页。

③ 《斯托莫尼亚科夫致鲍格莫洛夫的信》(1936年5月19日),李玉贞译:《〈中苏外交文件〉选译(上)》,《近代史资料》总79号,1991年7月,第231—233页。

④ 《鲍格莫洛夫致副外交人民委员电》(1936年5月27日),李嘉谷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5—56页。

⑤ 《贺武致艾登电》(1936年5月31日),《民国档案》1990年第1期,第57—58页。

⑥ 《贺武致艾登电》(1936年6月23日),《民国档案》1990年第1期,第61页。



先看苏联。在长期困扰中苏关系的主权问题上,苏蒙互助协定后,没有出现新的尖锐对立。而在此前的老问题中,除中东路已于1935年3月出售于日本外,对新疆和外蒙,苏联至少在表面上并不否认中国的主权。另外,在承认蒋介石与国民党政权方面,1936年8月,苏联通过刚刚恢复的同中共中央的联络,由共产国际出面指导中共中央:“把蒋介石和日寇等量齐观是不对的。这个方针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抗日。”“必须采取停止红军同蒋介石军队之间的军事行动并同蒋介石军队协同抗日的方针”。<sup>①</sup>其后,国共两党1936年初以来为建立抗日合作而断断续续举行的谈判开始取得进展,中国共产党联蒋抗日的新姿态,竟使蒋介石不时产生中共已愿“归顺”的错觉。<sup>②</sup>

与苏联形成对照的,是日本在侵华道路上越走越远,而其背景则是对蒋介石的疑惧和对中苏接近趋势的仇视。1936年6月10日,日本陆军省军务局局长矶谷廉介在与李滋罗斯会谈时说:蒋介石是中国最强领袖,但南京政府不可信任,只代表暂时的稳定,而日本需要的是长久的稳定。他还提出,中国政府真正代表中国民众的标准“是愿意同日本合作,停止反日宣传,通过各地的镇压来消灭共产主义”。为此,日本宁可面对目前的混乱也不愿在日后遇上更糟的麻烦。<sup>③</sup>三天后,在致李滋罗斯的备忘录中,矶谷还针对英方“既然日本希望消灭中国的共产主义,为什么要反对中国遏制共产主义的堡垒即南京政府”的问题,回答说:“因为我们熟知国民党对待共产党的方针的历史,我们自然要怀疑国民党和南京政府对共产党的真实态度。此外,联系到南京政府中的某些有影响的分子,我们认为,近来关于苏联和中国之间达成秘密协定的报告,不能简单地归之为谣传。”“在反共问题上,对这个政府不可能予以绝对的信任”。<sup>④</sup>其后,8月7日,日本五相会议制定的《国策基准》,确定了对北驱除苏联威胁,对南向南方海洋发展的南北并进的扩张路线。<sup>⑤</sup>与之配套的《帝国外交方针》则规定,鉴于日苏关系的现状,今后对华政策的重点是“首先使华北迅速成为防共、亲日满的特殊地区,并且一面获取国防资源,扩充交通设施,一面使整个中国反对苏联、依附日本”。<sup>⑥</sup>为贯彻此重点,其对华措施,是要逼迫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防共协定,缔结对苏军事同盟,促进悬案的解决。后者包括要让中国向日本聘用政治顾问、军事顾问和军事教官等。<sup>⑦</sup>

这样,日本越是加强对华压迫和对苏威胁,就越是促成中苏接近;而中苏越是接近,反过来又越是刺激日本进一步加强对华压迫和对苏威胁,从而进一步促成中苏接近。中日苏关系就这样陷入了一个特殊的循环。伴之而生的是中国“亲俄而恨倭”的氛围<sup>⑧</sup>和“亲日是死路,联苏是活路”的认识。<sup>⑨</sup>在这种内外环境的制约下,蒋介石在客观上已经没有多少灵活选择的余地。但和一般民众不同,面对只鼓励中国抗战却拒绝缔结中苏互助条约的苏联,蒋介石深深怀疑其真实动机。与之相

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8月15日),《苏联新发表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文件(之二)》,《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87页。

② 在1937年上半年的《蒋介石日记》(手稿)中时有记录。

③ 《克来武致艾登电》(1936年6月11日),《民国档案》1990年第1期,第60页。

④ 《矶谷将军致李滋罗斯备忘录》(1936年6月13日),《民国档案》1990年第1期,第63页。

⑤ 五相會議「国策の基準」(1936年8月7日),日本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年表註主要文書」下卷,344—345頁。

⑥ 四相會議「帝国外交方針」(1936年8月7日),日本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年表註主要文書」下卷,345—346頁。

⑦ 「对支实行策」(1936年8月11日關係諸省閣決定),島田俊彦編「現代史資料」第8卷、みすず書房、1963年、366—367頁。

⑧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6年10月6日。

⑨ 「須磨總領事より有田外務大臣宛電報」第890號(1936年11月3日),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日支外交關係雜纂(松本記錄)」,A.1.1.0.9松。

关,由于联苏抗日必然给中共带来发展机会,蒋介石在考虑到长远的后果时,充满忧虑。<sup>①</sup>因此,1936年6月以后,蒋介石虽然在抵抗日本侵略方面日趋坚定,直至在11月发动绥远抗战并赢得胜利,但在“联苏”问题上却仍然处在深刻的纠结与犹疑之中。结果,在行动上,他一边以抗日为目标通过各种途径推进与苏联和中共的谈判,一边则对苏联及中共保持高度的警惕,并继续以日本最重视的防共问题为筹码,谋求缓和中日关系。

从下面按月例举的几个相关史实中,我们对此点可逐步加深印象。

6月19日,苏联驻华武官雷平通过杨杰告知中方:苏蒙协定虽有妨碍中国体面之处,然苏俄之重要主张实对日本,系为远东问题不惜一战之暗示。日本陆军之对象既为苏俄,若在与苏俄未开战之前用大兵向中国挑衅不啻自毁前程。故彼目下一切行动谓之为烟幕,亦无不可。中国如为烟幕所眩则令人可惜。<sup>②</sup>苏方此言意在推动中国对日抗战。但7月11日蒋介石仍令张群发表公开谈话,在指出华北因日本大规模走私和增兵“颇呈现不安状态”后,强调“外交似尚不无运用余地”,呼吁日本“为东亚和平前途计,应迅由正当途径共谋有利于两国邦交之调整”。<sup>③</sup>

7月29日,蒋介石提醒自己,对苏对日都“必先求独立而后有所运用”。<sup>④</sup>8月6日,他强调中国在外交方针上必须“以独立自由而不为人工具为基点”。<sup>⑤</sup>其时,两广事变已经接近解决,蒋介石特地要张季鸾转告日方,“若虑中国政府于解决两广后将转趋强硬,此属错误。实则两广了结后,政府将努力于外交之进行”。张同时还告知日方:“关于日本之对俄备战,中国并不欲加以妨碍,故即关于内蒙之事日本亦尽可与我中央商量。”<sup>⑥</sup>

9月以后,中日双方以成都事件等为契机,由张群与日本大使川越茂等出面就调整中日关系开展谈判。谈判伊始,日本武官喜多诚一就通过张水淇警告中国政府:蓉案不重要,重要的是调整全部国交,而“最紧关键”是中方须表明究竟联苏抑联日,如中方不能表明联日,彼即认中国联苏,即办其应办工作。<sup>⑦</sup>恐吓之意,溢于言表。对此,蒋介石于9月16日囑张嘉璈向日本“转达外交最大之限度,如逾此限度当不惜决战”。但同时,蒋决定“持其志毋暴其气,对倭虽准备牺牲,但仍不忘和平与待时之方针”。<sup>⑧</sup>其后,在谈判中,围绕作为主要议题之一的“共同防共”问题,中方一边坚决拒绝日方“全面防共”的要求,一边在“局部防共”问题上保持灵活态度,以换取日本同意取消《塘沽停战协定》,交还华北主权。<sup>⑨</sup>

另外,基于对此间正在同时进行中的中苏谈判的感受,蒋介石在9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苏俄专在我国社会上工作、宣传,“以为将来使中国不能不出联俄之一途,其计之险,甚于倭寇也”。<sup>⑩</sup>为此,在10月8日和川越茂的会谈中,蒋介石提醒日方:要重视中国人亲苏反日的原因,以行动转变

① 早在1936年5月的内部谈话中,蒋介石就强调“日苏战争非中国之福,苏联若胜,则中国必被‘赤化’”,详见日本外务省编《外務省執務報告》昭和11年(1—2)、クレス出版、1993年、7頁。

② 《杨杰呈蒋中正摘要录陈与俄驻华武官雷平谈话》(1936年6月2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200-00472-137。

③ 叶健青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37),台北,“国史馆”2009年版,第407—408頁。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6年7月29日。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6年8月6日。

⑥ 《张炽章致蒋介石报告》(1936年8月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103-00002-014。

⑦ 《张嘉璈呈蒋介石》(1936年9月1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20200-00026-059。

⑧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6年9月16日、9月26日。

⑨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6年9月26日、9月30日“本月反省录”、10月6日、10月10日。中方关于这一中日交涉的详细记录见《调整中日国交》,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11-01-02-10-01-079、11-01-02-10-01-080。

⑩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6年9月28日。

中国的反日空气,否则就不具中日共同防共的先决条件。<sup>①</sup>此时,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通过一起在日内瓦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顾维钧,连续向南京发出“中国须先自助,对日稍加抵抗然后可说到他国援助”的建议,并在否定互助条约的同时,承诺当中国“与某国发生冲突时俄必先以物质协助”。<sup>②</sup>对此,蒋介石的反应是,对俄交涉须以“中共问题绝对无关,不在接济而在互助”等项为原则。<sup>③</sup>他还提醒自己注意,“对倭拒绝一切尚非其时,尤以防共问题为更重要,否则不能与俄交涉也”<sup>④</sup>;对中共战略则须重视“甲、限制其向东奔窜,勿使其挑起中日战争,贻害党国;乙、限制其向北奔窜,勿使其与外蒙联络,打通接济之路;丙、限制其在宁甘阿拉番边境,设法解决之”。<sup>⑤</sup>

11月4日,张群致电蒋介石,请示能否于翌日向日方提出中方的下述最后意见:“(一)一般防共问题务望日方撤回勿谈。(二)北部边境防共问题须日方提出具体内容后方可商讨,但冀东及察绥匪伪军问题务须同时解决。若日本坚持冀东等问题只能作为绅士协定,则我方对北部边境防共问题,亦只有俟日方履行此绅士协定时,再行商讨。并告以此系我政府之最后意见,下次川越大使见张部长时,若能搁置防共问题不谈,而就其他问题续行商讨,则张部长随时可以接见。倘仍如前数次之会议以防共为中心,则我方对此问题之最后意见既然如此,继续谈判亦属无益。”<sup>⑥</sup>对此,蒋介石在11月5日一度回复同意,却马上又在7日决定“接岳军来会商,对倭交涉不可坚拒防共问题,但必须以华北主权收回为代价”。<sup>⑦</sup>12日他还在日记中指责张群说:“岳军对防共问题要求川越撤回,殊违意图,昔日太怕而弱,今日太刚而愎者,是其皆不明情势也。利害之所致也。人才难得,外交尤甚,可叹。急令其以只要倭暂不再提此案则可止矣。”<sup>⑧</sup>15日,他又在日记中强调“俄使与‘赤匪’之狡计仍未变也,端在吾人之自强而已”。<sup>⑨</sup>

综上所述,1936年6月至11月,蒋介石在防共问题上的态度是灵活而又暧昧的,其实质则是对苏联和中共的疑惧与防范。

#### 四、纠结中的决断

1936年11月中旬后,中日苏三角关系中接连发生了两件影响重大的事件。

其一,是日德两国11月25日正式签订《日德防共协定》。由于苏联在该协定尚在谈判和草签阶段就探知了该协定包括秘密文件在内的内容,故进一步增强了打破日德夹攻的紧迫感。作为其结果之一,是苏联更加强化了为实现“以华制日”目标而开展的对华工作。11月中旬起,苏联当局接连会见刚刚上任的中国大使蒋廷黻,在中国国内,苏联外交官也密切接触各方人士,推动中国走向抗战。<sup>⑩</sup>

① 参见「須磨總領事より有田外務大臣宛電報」第810號、島田俊彦編『現代史資料』第8卷、317—319頁。

② 参见《张群致蒋中正电》(1936年10月2日)、《张群致蒋中正电》(1936年10月1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90400-00007-045、002-090400-00007-047。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6年10月15日。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6年10月18日。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6年10月31日。

⑥ 《张群支电》(1936年11月),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20200-00026-079。

⑦ 《蒋介石对张群支电的复电》,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20200-00026-079。《蒋介石日记》(手稿),1936年11月7日。

⑧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6年11月12日。

⑨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6年11月15日。

⑩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与蒋廷黻的谈话记录》(1936年11月19日)、《斯托莫尼亚科夫与蒋廷黻谈话记录》(1936年12月9日),李玉贞译:《〈中苏外交文件〉选译(上)》,《近代史资料》总79号,1991年7月,第241—247页。

其二,是众所周知的张学良扣留蒋介石等重要人物的西安事变。在蒋介石面临生死关头之际,苏联当局立即以官方媒体公开谴责张学良,并通过共产国际引导中共和平解决事变,为蒋介石脱离险境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sup>①</sup>九死一生的蒋介石最终接受了事变发动者的要求,答应“联红容共”和“联俄联英美”。<sup>②</sup>

但是,其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虽然确实停止了剿共,并积极准备对日抗战,其对苏联的警戒及伴之而生的对联苏的犹疑却并未消失。这是因为,不仅苏方仍然拒绝缔结中苏互助条约,而且中方在经过十几个月来的对苏交涉后,对苏联的认识也越来越接近实际:1937年2月17日,张群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报告外交时说:苏联“整个的国策还是在避免战争,完成建设。所以近年以来日苏对立形势虽日趋尖锐,尤其苏日、苏伪之间的边境纠纷层见叠出,随时有引起战争的可能,然细察苏俄对日交涉,事事表示退让,如出卖中东路,以及库页岛油田、北海渔权等问题次第解决。日德协定发表后,苏俄曾表示拒绝签订渔约,然而结果还是承认旧约延长一年。这种事实都可以证明苏俄竭力避战。然则苏俄在远东方面绝对不能为中国多负责任,致妨其避免战争完成建设的国策,不难推想而知”。他还说,“现在我们必须说联俄,应该研究中苏间现在不能解决的问题如何解决,现在应该做的事如何去做。例如中苏商约问题,我们方面已为极大的让步,而苏俄方面对于友好的名称、政治的条款仍是不肯商谈。我们推想就是商约成功以后,其余的问题也不能够如同一般人所意想的容易”,“我们对于苏俄的期待,在苏俄国策转变以前,恐不易达到进展的目的”。<sup>③</sup>

与张群这份悲观的展望相呼应,同月24日调查统计局的报告说,西安事变以来苏联对华北“赤化”工作渐次活泼,其密使会见毛泽东,商讨今后之指导方针如下:

- (一) 决定符合南京政府之抗日口号。
- (二) 宣传人民阵线之旨趣。
- (三) 绝对避免使人联想“赤化”工作与共产主义有直接联系之关系。
- (四) 在陕甘方面与新疆同样,使其第二外蒙古化。
- (五) 因此将“赤化”中心置于下级干部与士兵及下层民众,使上层分子傀儡化。
- (六) 诱导其余势力于抗日,战线移至绥远、察哈尔、山西。此外更以汉口、上海为实行之重心,任命周恩来负责实行,复派秦邦宪为特派员,由西安经汉口而赴上海,在上海以文化救国会为中心机关,积极活动。

第三国际最近向中国共产党发出如左之指令:中国之出路惟有以抗日为基础,共产同志今后应在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区内以人民阵线而与国民党妥协,极力避免直接与苏联政府合流之形式,在中国黄河以西建设人民阵线国家。<sup>④</sup>

调查统计局的这份报告虽然是源于其谍报活动,并非完全准确,但足以引起当政者的悬念。

<sup>①</sup> 事后蒋介石特地就西安事变期间苏联的态度向苏方表示了感谢。参见《苏联驻华全权代表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的电报》(1937年4月3日),李玉贞译:《〈中苏外交文件〉选译(下)》,《近代史资料》总80号,1992年1月,第188—190页。

<sup>②</sup> 《周恩来、博古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2月24日),《关于西安事变的三十四份文电(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七年二月)》,《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第34页。

<sup>③</sup> 张群:《最近之国际动向与我国对日外交》(1937年2月17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编目不详。

<sup>④</sup> 《调查统计局呈蒋中正西安事变后苏联对华赤化工作指导方针》(1937年2月2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200-00276-081。

3月15日,蒋介石强调:中国始终在俄倭夹攻中自求出路,“今年之中国必须在日本伪亲善及‘共匪’假投降情势之下稳定本国阵线,加强国力之充实”。<sup>①</sup>

另一方面,驻苏大使蒋廷黻在发回南京的对苏观察中,也对苏联不抱乐观态度。譬如,在4月提交国民政府外交部的一份报告中,蒋廷黻特别提醒当局注意:“苏联之外交政策完全避战政策也。国人切不可有丝毫之误会。即对日、德两国,苏俄亦毫无挑战之意。不仅如此,苏联且愿为维持和平作相当之牺牲。”“苏俄对日、德宣传之积极与乎事实上之消极,引起欧人一种推测,以为此邦之实在外交政策在期待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相互战争而苏联则坐收渔利。所谓渔利有两层:一为苏俄国家之利益,一为世界革命之利益,盖战后不免引起国内阶级革命也”。接着,在具体分析中苏关系时,蒋廷黻强调指出,“苏联当局一面极望吾人抗日,其代表与国人私自谈话亦竭力鼓动吾人抗日,然彼辈政府曾未与我国政府说一句负责的着实边际之话,且苏联本身对日尚力求避战。此乃职对苏联最不满意之点。更可恶者,彼在我国制造抗日潮流,使我国人民与我政府为难,几至挟我人民以迫我政府。我人民知识幼稚,感情用事,不知世界各国人皆推行本国本位之政策,绝不愿为他国做冯妇。吾国处此危急之秋,何暇参加彼共产与法西斯之世界争霸?”<sup>②</sup>

因此,尽管苏联于4月再次表示愿意向中国提供军事物资的意向,并在互助条约问题上有所松动,表明“如果太平洋公约不能签署,那我们准备以后重新考虑缔结苏中双边互助条约可能性的问题”。<sup>③</sup>但是,中方对苏方提出的首先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要求,因“关系我国存亡至深至钜”,始终只允慎重考虑,而未作切实之答复。<sup>④</sup>

对于中方的冷淡反应,苏方认为和当时日本对华政策正处于缓和时期有关。<sup>⑤</sup>这也是有其道理的。1936年末,由于中国抗日情绪高涨,日本出现了“对华新认识”。譬如,1937年2月,海军军令部的横井忠雄大佐在《关于对华方策再检讨的意见》中指出:中国民众的抗日意识虽然和欧美各国的策动有关,但也不能否认其亦有缘于日本的对华政策过分霸道的一面。世界大战后,法国对德国的高压政策反而促使德国成为一个强大的统一国家。日本不能重犯法国的错误。<sup>⑥</sup>同月,陆军的楠本实隆大佐也指出:考虑到中国和日本的现状,日本已不可能继续沿用“满洲事变”时的高压政策来对待中国。日本推行的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和分离华北五省的政策,反而招来事与愿违的后果。因此,我方那种排斥中国中央政府,专图通过对其地方政权的利用、胁迫来主导中日关系的做法已经过时。日本今后须知“以恐吓将我方意志强加于中国的时代已经过去,对华压迫反而强化中国的抗日意识”。<sup>⑦</sup>出于这种反省,2月后,日本在林銑十郎内阁时期曾一度尝试过由佐藤尚武外相主导的谋求中日缓和的所谓“佐藤外交”。对此,蒋介石也在3月6日与英国大使的谈话中表示过期待,说“今后惟视林内阁能否稳定,如能即此稳定下去,目前难关或可度过”。<sup>⑧</sup>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7年3月15日。

② 详见《蒋廷黻致外交部报告》(1937年4月),《民国档案》1989年第1期,第25—31页。

③ 《鲍格莫洛夫与王宠惠外长谈话记录》(1937年4月12日),李玉贞译:《〈中苏外交文件〉选译(下)》,《近代史资料》总80号,1992年1月,第190—191页。

④ 《王宠惠致蒋介石意见书》(1937年7月8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2),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325—326页。

⑤ 「ボゴモロフよりの書簡」(1937年5月5日),转引自ボリス・スラヴィンスキー「日ソ戦争への道」,92页。

⑥ 参见横井忠雄「对支方策再检讨に関する意見」(1937年2月3日)、島田俊彦編『現代史資料』第8卷,385—386页。

⑦ 参见「楠木大佐の対支政策意見」(1937年2月18日)、島田俊彦編『現代史資料』第8卷,389—390页。

⑧ 《蒋介石与英国驻华大使的谈话》(1937年3月6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8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50页。

但是,与蒋介石的期待相反,日本内部很快就出现了对“反省”的反对声音。其理由是“日本的让步只会招致中国的傲慢”、“局部的退却将引起大局的崩溃”。结果,佐藤外交只是昙花一现,对华强硬论照旧主导日本的对华政策。<sup>①</sup>而其特点,则是不仅拒不解决东北问题,而且还力图霸占华北,并将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视作阻挡日本对华政策的最大障碍,必欲除之而后快。<sup>②</sup>而作为其结果之一,就是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的爆发。

对于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国策大计,蒋介石虽然对日坚持不挑战、必应战的强硬态度,并在对苏关系上立即再次呼吁苏联和中国缔结互助条约,但在苏联仍然排斥互助条约,且以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作为对华接济武器的交换条件后,蒋介石最初仍再三予以拒绝。<sup>③</sup>因为,出于对“狡诈无比”的苏联外交的不信任感,蒋担心“苏联先与我订不侵犯条约,借此威胁倭寇,要求与倭亦订不侵犯条约以为固守中立之计”。<sup>④</sup>而在中国当政者中,也有不少人担心,中日战争的结果,中国与日本必两败俱伤,“终将使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坐收渔人之利”。<sup>⑤</sup>但是,后来在中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而能够对华提供军需等实质性援助的国家唯有苏联的无奈之中,蒋介石尽管内心纠结不已,最终还是同意了苏方的要求。8月21日,中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作为它的附件,双方还交换了如下内容的“永久不得正式或非正式公布”的“绝对密件”:

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全权代表于本日签订不侵犯条约时,代表本国政府声明在中华民国与日本寻常关系未正式恢复前,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不与日本缔结不侵犯条约。

中华民国全权代表代表本国政府声明,在本日签订之不侵犯条约有效之时,中华民国不与任何第三国签订任何所谓共同防共条约,该项共同防共条约事实上系专对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sup>⑥</sup>

从1931年以来一直困扰蒋介石的抗日与防共的两难抉择就此定局。而由于其后日本当局一直坚持以“共同防共”为中日媾和的主要条件,国民政府即使为维护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绝对密件”,也唯有抗战到底了。

因受篇幅之限,关于最终导致这一结局的详细因果关系,只得留待另文考察。作为本文的结尾,这里仅介绍蒋介石的两则日记,以从中揭示蒋介石最终抉择的几个基本视角。

其一,1937年7月31日的蒋介石日记写道:“倭要求我共同防俄、承认满伪与华北特殊化。若与俄先订互不侵犯条约,则可先打破其第一美梦,不再要求。盖允其共同防俄以后,不仅华北为其统制,即全国亦成伪满第二矣。故联俄虽或促成倭怒,最多华北被其侵占而无损于国格,况亦未必

① 参见鹿锡俊「多角的検証から見る対中認識のあり方——日中戦争への心理的な側面を中心に」、『大東アジア学論集』特別号、2015年3月。

② 其具有象征意义的事实,是日本在战争爆发不久就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并在其后长期坚持以“蒋介石下野”为媾和条件。

③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致外交人民委员部电》(1937年8月22日),李玉贞译:《〈中苏外交文件〉选译(下)》,《近代史资料》总80号,1992年1月,第217—218页。据该电称,中国政府在最后时刻还在动摇。

④ 参见《蒋介石日记》(手稿),1937年8月1日、8月2日。

⑤ 《何应钦与日本驻华陆军武官喜多诚一谈话》(1937年7月19日),《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编辑委员会编:《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册,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571页。

⑥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附件 口头声明》(绝对密件永久不得正式或非正式公布)(1937年8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20300-00042-002-042。

能为其全占也。两害相权取其轻,吾于此决之矣。”<sup>①</sup>这一“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观点,是理解蒋介石所作决断的第一个重要视角。

其二,1937年10月31日,蒋介石在自我剖析自1928年济南事件“十年以来对倭之决心与初意”时写道:

甲、如我与之妥协,无论至何程度,彼少壮侵略之宗旨必得寸进尺,漫无止境,一有机会彼必不顾一切信义,继续侵略不止也。

乙、即使解决东北问题,甚至承认,彼以后亦必继续侵华,毫无保障。一时妥协不惟不能奏效,徒自破坏人格与国格而已。

丙、倭之望我与之妥协者,其惟一目的为破坏我人格,使中国无领导中心也。

丁、此次抗战无论结果与成败如何,但如不抗战而与倭妥协,则今日国乱形势决非想象所能及也。

戊、倭寇非先击败我革命军,确实处置中国后,决不敢对俄开战,故我国虽欲与倭谋妥协以待机,决不可能。

己、总之,倭寇对我,一得国际动摇机会必先向我进攻,此无可挽回,亦不能用任何策略转移者也。

庚、此次抗战实逼处此,无可幸免者也。与其坐以待亡,致辱招侮,何如死中求生,保全国格,留待后人起而复兴?况国际形势非由我自身牺牲,决不能唤起同情与干涉耶。

辛、解决中倭问题惟有引起国际注意与各国干涉。今九国公约会议已有召集确期,国联盟约亦有较好之决议,此乃抗战牺牲之效果也。<sup>②</sup>

这段日记很长,但可归纳为,经过10年来的种种尝试,蒋介石已经认定:1. 对日本的妥协,只会招致对方得寸进尺。2. 等待日苏先战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有中国首先对日抗战,才能换来日苏战争和“国际注意与各国干涉”,以最终借助国际力量解决日本问题。这是理解蒋介石所作决断的另外两个重要视角。

## 五、结语

笔者过去在论及1933—1934年间的中日苏关系时曾总结说:历史过程及身处其中的历史人物都不是单纯划一的,多种因素包括对立的因素同时存在,构成多种错综复杂的矛盾。正因如此,当局者的政策运作也是在矛盾中进行的。他们必须兼顾多方面的问题,应对多方面的可能性,其中很多东西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排斥。这样,今天的人们在研究过去的历史过程与历史人物时,也应该时时注意潜伏于研究对象中的多元性和变动性、反复性,而不能把问题单纯化,似乎一个时期只能有一种单一的、固定的政策或倾向。<sup>③</sup>

在为以1936—1937年间的中日苏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本文作结语时,笔者特别想再次强调上述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7年7月31日,“本月反省录”。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7年10月31日,“本月反省录”。

③ 参见鹿锡俊《蒋介石的中日苏关系观与“制俄攘日”构想——兼论蒋汪分歧的一个重要侧面》,《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

观点。因为,对这一阶段的蒋介石而言,如何综合处理对日、对苏关系及其中“抗日”与“防共”这一组复合性的课题,仍然是一个艰难的挑战。其症结,不在要不要防共,也不在要不要抗日。因为,这二者都是蒋介石真心想做的事业。蒋的困惑是,在无法让二者齐头并进的两难困境中,如何临机决定孰先孰后。俗语谓“敌人的敌人是朋友”。但在当时的蒋介石眼里,日本是敌人,苏联也是敌人。因此,“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观点,既可用于日,亦可用于苏。这就格外加深了蒋的纠结。总之,蒋介石在此阶段的大部分时期并未单纯偏向于“联苏抗日”或“反苏和日”。他的最大愿望,仍然和1933年以来多次尝试的战略一样,是以“中立”促成日苏两国之相互牵制,实现既“抗日”又“防共”的双重目标。这两个方面在质、量上随各阶段矛盾的变化及蒋介石对矛盾之认识的变化而各有侧重,绝非平均对待,但在时间上则是平行不悖的。

对于“抗日”这个侧面,由于今日的人们都知道中日矛盾是那一时期的主要矛盾,因此可能疑问不多;反之,对于“防共”这个侧面,则可能感到困惑不解。其背景,是因为人们往往囿于“敌人的敌人是朋友”或“日苏冲突是中国的机会”的所谓常识,而忘记了当年中苏关系本身内含的敌对性因素,忽视了被一种矛盾掩盖着的另一种矛盾。

就本质来说,这一阶段中蒋介石思想深处关于“倭患急,俄患缓;俄患大,倭患小”的认识基本上没有变化,其对日对苏考量的特色是:当“倭患”之“急”尚停留于中国能忍耐的限度之内时,他就优先从“患之大小”的考虑出发,为更有利地因应各种内外课题而不惜“借日制苏”;当“倭患”之“急”超出中国能忍耐的底线之时,他就优先从“患之缓急”的考虑出发,为克服“急患”而不惜利用“缓患”,联苏抗日。尽管各个时期的程度有异,但这种反复一直持续到他正式发动抗日战争才告一段落。而最后使蒋介石倒向“联苏抗日”的最大外因,则是这一阶段日苏两国在对待中国主权和政权问题上“急”“缓”姿态的日趋相反。尽管蒋介石一直怀疑苏联的动机,但在无法同时解决“抗日”与“防共”两大课题的客观环境中,最终他就只得优先于以“缓”制“急”的抉择了。从这个意义来说,这一阶段中一直致力于阻止蒋介石联苏抗日的日本当局,恰恰是蒋走向联苏抗日的最大促进者。

[作者鹿锡俊,日本大东文化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

(责任编辑:马晓娟)